

“份子钱 猛于虎”

——人情链条中如何给红包“减负”？

核心提示：元旦您是怎么度过的？不少人在 2012 年的第一天就奔赴在“随礼”的路上。而刚刚过去的 2011 年，被很多人认为是结婚随份子的最高年，随着春节将至，更多人还将面临人情消费的考验。

“份钱猛于虎” 因为人情被动花钱

网友“骑自行车的鱼”在微博中诉苦：“2011 年 12 月已经随礼了 10 份”；相声演员郭德纲也戏谑道：“今年没少随礼，威廉王子结婚随 500，本·拉登去世随 600，卡扎菲随了 1000，眼瞅年底了，该清静了，金正日又走了。”太原市民李伟光说，以前随礼不外乎婚丧嫁娶，现在又是生日聚会，又是同学聚会，还有百日宴、周岁宴、寿辰宴、升迁宴、开业宴、升学宴、参军宴、乔迁新居宴，各种名目繁多的随礼让人应接不暇。

在中国网组织的“别样的生活，你打算怎么过？”的调查中，超四成的人认为经常会因人情而被动花钱。

人情消费不仅种类繁多，而且“份子钱”也水涨船高，在新浪微博组织的一次投票中，6000 多位网友在“好友结婚你会随礼多少”中投票，其中 39% 的人群随礼金额在 100 元至 400 元之间，38% 的人群在 400 元至 1000 元之间。

在山西省忻州市政府机关工作的崔先生算了一笔账：他 1995 年参加工作，当时月工资不到 300 元，随个礼 50 元即可；到了 2002 年，工资涨到 1000 元以上，礼金达到 100 元；现在

关系最一般的，没有 200 元根本拿不出手。

从 2010 年开始，崔先生感到礼钱又在上涨，仅 10 月份，他参加了 4 个婚礼，嫁女或小孩生日的宴会，每次都随了 500 元礼金，半个多月的工资没有了。而现在，他每个月工资还不足 4000 元。不少人感喟说，份子钱甚至让工资入不敷出。

“人情货币化” 消费链条越拉越紧

“人情来往知多少，请帖数不了。今日盛行应酬风，钞票不堪回首口袋里。亲友情谊应犹在，只是规模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杯杯酒水肚中流。”这首流传甚广的打油诗表露出了群众在人情消费中颇多无奈的心迹。

既然大家都背负着人情消费“沉重的壳”、为“份子钱”所累，为何不能置身事外呢？

“不去不行啊，中国人都重人情、爱面子，不去就没法再跟人打交道了，而且礼轻了还觉得拿不出手。为了这份人情，只好硬着头皮去吃‘高价饭’。”太原市民李伟光说。目前，吃“高价饭”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口头禅。

高昂的人情消费已成为中国社会的“时尚病”，无论是嫁娶、得子或老病，亲戚、朋友及同事不仅要送个红包表示一下，而且数额越送越大，人情消费令普通人叫苦不迭。

城市如此，农村更严重。在部分农村，孕妇生产、建房、修房、工作转正、搬家，甚至已故亲人的周年忌日，只要沾喜沾丧都要大摆宴席，亲朋好友、乡里乡亲就都得来随份礼。

山西省柳林县下堡村的李世亮说，他一家 3 口人，全靠他一人在外打工挣钱，年收入不到 2 万元。现在上礼

钱已成为家里最大的生活负担。关系特别近的随礼要三百五百元，关系一般点的也得一百二百元。一年下来，至少三四千元的上礼钱，着实令人苦不堪言。

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方毅华认为，在人情消费中不能自拔是因为从众心理在其中作祟，有时身不由己更多来自外界“压力”。

山西长子县常绍伟说，在安葬父亲期间，即便他和家人想丧事从简，但也听到过村里的议论，“他们四个孩子都在外工作，这白事还不得办大点？”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常嗣新认为，目前从官方到民间，人情货币化已经十分严重，甚至陷入一种投资回报的运作模式。“今年整体送出一万元，明年我一定巧立名目赚回来。”长此以往，“人情”味道越来越淡，交易味道越来越浓，陷入人情消费名目越来越多的恶循环之中。

人人都厌恶这等风气，但谁都不愿意先停止，否则就吃亏。一旦发生人情来往、进入人情消费的圈子，这条人情消费链不但不会轻易断掉，而且会越拉越紧。

更严重的是，过度的人情消费危害还不单单瘪了钱包、费了心思，网友“未知可否”等认为，“人情消费过重会无意中助长灰色收入、败坏政风。”现实中人情消费更成为某些贪腐分子趁机敛财、滋生腐败的温床。

水涨船更高 “红包”如何抵御通胀

随着物价上涨，“红包”价位也水涨船高，“人情消费”已成为许多城市居民不小的经济负担，人情债越背越重，特别是一些低收入家庭更是不堪重负。



记者采访中发现，过重的人情消费是“穷人怕，富人愁，干部群众都挠头。”尤其在农村，群众农民致富不易，应该将钱花在刀刃上。

明知是陷阱，何必作茧自缚？也有网友对“人情债”有清醒认识，网友“月姐背单词”就认为：“每个人过生日的方式不同，我的生日是我的事，我不想把钱浪费在人情消费上。”

山西长子县南漳镇酒村在去年成立了红白理事会，提倡理性人情消费，并积极倡导移风易俗，“基本原则是，在村里办白事不能请吹拉弹唱的戏班子。”红白理事会主任宋启明说，现实中群众都支持“从简”原则，“红白理事给群众提醒，也便于群众就坡下驴，顺应大势。”

“民事民办”，宋启明表示，为红包“减负”应从我做起，辛勤劳动挣来的钱，应该用到点子上、用到刀刃上，不

再为人情所累，让大家尽早从人情债中解脱出来。

为了方便人们进行收情管理、送情管理，网络上甚至出现了“人情小助手”的理财软件。还有网友总结出一套可以充分抵制通货膨胀的随礼方法：“以后每参加一个婚礼，我都打一个白条，后面写上温馨提示：请持此券参加我的婚礼。”

不少人建议倡导一种理性的新型人情消费模式。比如可以采取一些更有心意的方式传递人情，“寄张贺卡、打个电话、送束鲜花或者组织一些小型聚会，既交流感情、又节约实惠。”

广州市民唐雅娟认为，“君子之交淡如水、礼轻情义重。”礼尚往来不应关注礼金的多少，在她即将到来的喜宴中，她更看重传达的情义与祝福。

(据新华社)

“我们的新年愿望”

——记者蹲点火车站倾听返乡打工者心声

核心提示：沉甸甸的行李，沉甸甸的心愿。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到来，一些打工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扛上大包小包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为城市默默奉献的他们，对于刚刚到来的 2012 年，有什么期待？记者来到火车站，倾听各个年龄层打工者们的的心声。

“60 后”心愿：帮助子女成家立业、攒钱养老

一边吃着方便面，一边眼睛盯着通报进站信息的电子显示屏，来自河南周口的薛运动对回家充满了期待。“终于攒够了钱，今年要盖新房给儿子娶媳妇呢！”说起新年愿望，薛运动很自豪。

和薛运动一起回家的还有 8 位老乡，他们都是高铁的建设者，大部分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三五年。一根扁担和两个麻袋是他们每年回家不变的行李。造着高铁，却坐最普通的火车回家，他们说并没有不平衡，只是期待靠着双手挣到自己应得的钱，帮助孩子成家立业。

“我们这代人不求自己吃穿好，最大的盼头就是孩子有出息。”薛运动的老乡郑建国说。

郑建国的孩子今年 23 岁，2012 夏天将大学毕业，现在正在找工作。郑建国把一年攒下的 2 万多元钱寄给了儿子，要求他不论如何都要在郑州找份像样的工作。

“找了工作，还要买房，城里的花销可不像农村，所以我还要出来打工几年。”郑建国说，为了儿子能坐上高铁，他再苦再累也愿意。



资料图片：一些返乡过年的务工者在车站候车室睡觉。

今年 50 岁且抱上孙子的张海翔已经完成了帮助孩子成家立业的任务，但他希望趁着自己还有体力再打几年工，存点钱养养老。

“虽说现在农村也有养老和医疗保险了，但口袋里有点钱踏实，也好减轻子女的负担。”张海翔说。

“70 后”“80 后”心愿：孩子能在身边成长、在城里买房

火车站熙熙攘攘，周围人都在聊天中兴奋地等待着归家的火车，而 26 岁的杨文静却一直低头看着一张照片，不时用手抚摸照片中婴儿的脸。

“这是孩子满月的时候照的，已经 28 个月没有见到了，回去估计都认不得了。”杨文静轻声地叹了口气。

杨文静和丈夫张柱同来自四川宜宾的一个农村，从小青梅竹马的他们

四年前结婚并在第二年有了自己的女儿，而孩子刚刚三个月大时，他俩就双双返回杭州打工。

“要养孩子，不能不出来。”张柱说，为了多赚钱，前两年都没有回去过年，但今年想孩子想得熬不住了，所以提前和老板请假回家，打算好好陪陪女儿。

令杨文静和张柱难过的是，女儿已经三岁，但还不太肯叫爸爸妈妈。“每次都是奶奶在电话那头逼着她叫，她才肯叫。打算明年把她带到杭州来，和我们熟悉熟悉。”张柱说，他从新闻了解到留守农村对孩子的成长很不利，所以决定宁可少赚点钱也要把孩子留在身边教育。

不过来自四川宜宾的余兴友不太认同这样的想法，他觉得只有赚到了

足够的钱才能给孩子一个保障。“我打算等买了房子，再把孩子接过来，这样他以后才算是真正的城里人。”余兴友说，他和家里的两个孩子也都是两三年才见一次。

正是这样的想法，让余兴友和妻子刚刚回家给爷爷办完 80 大寿后放弃在家陪孩子过年的机会，匆忙地往打工地浙江海宁市赶——过年正是用工荒的时候，老板开的工资比平时高一倍。他们也是记者在火车站遇到的唯一一对在这时返回打工的人。余兴友说海宁市的房价每平方米已经达到了七八千元，而他们夫妻俩一年的收入是 10 万元。

“希望房价能够降下来，好让我们能早点团聚。”余兴友说。

“90 后”：创造自己的事业、融入城市

“90 后”的打工者在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里不难找，除了他们年轻的脸庞和时尚的着装外，还有一个一眼就能发现他们的特征：他们大多都低着头用手机在网上或者听歌。

“我一年至少换一部手机。”1992 年出生、从贵州到宁波已打工两年的刘栋说。

刘栋说，每当大品牌出新的手机他都会关注，然后去买山寨版的。“我们可不想落伍，现在是信息化时代了，一不小心就会‘out’。”刘栋说。

在“90 后”的心里，包装自己的一大目的就是融入变化飞快的城市，然而“刘栋们”觉得总还差那么一点。

“比如我不敢和城里的女生谈恋爱，怕有隔膜；有时也想去听场音乐会、喝个咖啡，但总觉得别扭，有点格格不入。”刘栋说，他想留在城市打拼，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成为真正的“城里人”。

“可我还是喜欢老家，虽然条件差点，但感觉更有人情味。”同样来自贵州的“90 后”刘雅说。

在刘雅的行李，记者发现有一床大红的婚被和四双棉线。“被子是自己结婚用的，棉鞋是定做给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的。”刘雅说，她打算结婚后不再出来打工。

刘雅初中毕业就走出了家门，先后去过广州、深圳，去年到杭州的一家服装厂做衣服。已经在外漂泊 6 年的她厌倦了奔波和为别人赚钱的生活，决定回家乡和家人一起生活，明年争取开个服装店。

“虽然自己开店很操心，但毕竟是自己打工，更有动力。”刘雅说。

(据新华社)